

# 同伴侵害与人际关系取向人格特质的交叉滞后分析: 城市原住民儿童与农村随迁儿童的比较<sup>\*</sup>

李梦婷<sup>1</sup> 范为桥<sup>1</sup> 陈欣银<sup>2</sup>

(1.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上海 200234; 2. 宾夕法尼亚大学教育研究生院, 美国费城 19104-6216)

**摘要:** 研究采用间隔两年的追踪设计, 分析了 477 名农村随迁儿童(男生 57.10%; 2014 年时平均年龄为  $11.54 \pm 0.64$  岁)与 245 名城市原住民儿童(男生 50.60%; 2014 年时平均年龄为  $11.36 \pm 0.51$  岁)的同伴侵害与和谐性、人际触觉两个人际关系取向人格维度的相互影响。这些儿童分别来自上海市采取融合教育的四所公立初中。他们首次参加本研究时为初中预备年级。交叉滞后分析表明, (1) 在原住民儿童组, 时间 1 的同伴侵害可以负向预测时间 2 的和谐性与人际触觉; (2) 在随迁儿童组, 和谐性与同伴侵害有负向循环作用关系, 且时间 1 的同伴侵害可以负向预测时间 2 的人际触觉。研究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际人格发展与所处环境(特别是同伴侵害的不利环境)的动态相互作用模式。文章最后讨论了原住民儿童与随迁儿童混合编班的融合教育模式对所有城市儿童适应社会转型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农村随迁儿童; 城市原住民儿童; 同伴侵害; 人际取向人格特质; 交叉滞后分析

**分类号:** B844

## 1 引言

同伴侵害(peer victimization)一般是指个体遭受的来自同伴的身体、言语、以及人际关系等方面攻击(Mynard & Joseph, 2000)。同伴侵害的形成既有侵害者(如攻击性强; 纪林芹, 魏星, 陈亮, 张文新, 2012)和被侵害者方面的原因(如友谊或者人际矛盾; Ames & Leadbeater, 2017), 也有来自环境方面的影响(如人文与社会环境压力; Leadbeater & Hoglund, 2006)。对处于相对不利情境的由农村迁入城市的随迁儿童而言, 同伴侵害一直是颇受关注的研究主题(郭海英, 陈丽华, 叶枝, 潘瑾, 林丹华, 2017; 袁晓娇, 方晓义, 刘杨, 蔺秀云, 2012)。然而, 随着随迁儿童在城市居住儿童总体中比例的增加, 城市儿童的组成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例如, 在 2011 年秋季, 上海小学生在校人数中, 随迁儿童人数占比达到 54.16%, 已经超过城市原住民

童(冯帅章, 陈媛媛, 金嘉捷, 2017; 上海统计年鉴, 2017)。这样, 原住民儿童的同伴结构及人际环境也随之发生改变。原住民儿童需要学会与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同伴相处, 也需要适应学校甚至社区成员结构的变化。因此, 关注社会变迁中城市原住民儿童可能面临的同伴侵害也应该是发展心理学研究的必然选项。

作为基本的个体差异变量, 多数基于大五人格的西方研究表明个体的人格特质会对其同伴侵害的程度有显著的影响(De Bolle & Tackett, 2013; Jensen-Campbell & Malcolm, 2007)。与此同时, 作为个体发展的重要微观环境变量之一, 包括同伴侵害在内的同伴环境也会显著地影响人格等个体差异的发展(Fung & Raine, 2012)。Lerner (2006)的发展情景理论突破了不同影响因素与个体发展之间单向作用模式的局限, 强调个体与其所处情境的动态相互作用, 并加入时间维度, 建构了个体发展的循环作用

<sup>\*</sup> 参与本研究的初中学生年龄在 11~14 岁之间。按照发展心理学的一般理解, 他们应该属于儿童晚期到青少年早期的发展阶段。为了与有关文献保持一致, 我们将参与本研究的学生以“儿童”指称。并且, 考虑到(1)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和(2)目前生活在城市的儿童人口基本由农村随迁儿童与原来拥有城市户籍的儿童共同构成的事实, 本文将农村随迁儿童简称为随迁儿童, 原来拥有城市户籍的儿童简称为“原住民儿童”。事实上, 这两类儿童都应该属于城市儿童, 即在城市生活或者居住的儿童。

基金项目: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BSH081)。

通讯作者: 范为桥, Email: fanweiqiao@shnu.edu.cn

模式,即个体对环境刺激的反应会影响个体的进一步发展。陈欣银等(Chen & Schmidt, 2015)提出的关于人格/气质的情境交互发展模型则强调了儿童人格发展中社会环境因素的重要作用。以此为基础,研究者逐渐开始关注并证实了同伴侵害与一些心理适应变量(如,外化问题行为、焦虑、抑郁等)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Reijntjes, Kamphuis, Prinzie, & Telch, 2010; 郭海英等, 2017)。另外的一些研究也支持了社会关系(如教师评价)与青少年人格发展的相互作用(Heaven, Leeson, & Ciarrochi, 2009)。

有鉴于此,在我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探讨面临着环境变迁的随迁儿童和原住儿童群体中人格特质,特别是具有独特生态效度的人际关系取向的人格特质(如面子、和谐性、人际触觉等维度; Cheung, van de Vijver, & Leong, 2011; 范为桥, 张妙清, 张建新, 张树辉, 2011)与同伴侵害之间的作用机制和模式,一方面可以促进我们对青少年人格可塑性的理解,同时也有利于我们针对性地采取相关预防和干预措施,减少同伴侵害问题的发生,进而促进包括随迁儿童与原住儿童在内的所有生活在城市的儿童和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与积极发展。

### 1.1 人格特质与同伴侵害

回顾同伴侵害与人格特质在儿童或者青少年人群中的关系研究,在不同的西方文化背景中(包括美国、比利时、希腊等国家),儿童/青少年的人格特质对同伴侵害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其中,报告了较高的责任感、开放性、宜人性和外向性的儿童/青少年较少受到同伴侵害(Jensen-Campbell & Malcolm, 2007; Kokkinos, Voulgaridou, Koukoutsis, & Markos, 2016),而报告了较高神经质的儿童/青少年则更可能受到同伴侵害(Jensen-Campbell & Malcolm, 2007; Knack, Jacques, Jensen-Campbell, & Malcolm, 2013; Kokkinos et al., 2016)。

另一方面,作为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的重要微观环境变量之一,同伴侵害反过来也可以显著影响他们的人格等个体差异特质的发展。例如,一项关于英国小学生的研究发现,观看同伴侵害的视频会正向预测儿童的人际敏感性人格特质(McDonnell, Stahl, Day, McGuire, & Valmaggia, 2017)。Kawabata, Youngblood 和 Hamaguchi (2014)在对日本四、五年级小学生的追踪研究中也发现,早期的同伴侵害可以显著预测六个月之后的被试边缘人格的

水平。

上述两类方向相反的研究结果表明同伴侵害与人格之间存在着可能的相互作用。然而,这些结果基本上是在大五人格框架下探讨了个人取向的人格维度(Yang, 2006)与青少年同伴侵害的关系。一方面,绝大多数研究基于横断设计完成,因而事实上只能分析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对于因果关系的分析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更无法探测人格特质与同伴侵害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作用关系。这样,使用追踪研究设计探讨人格特质与同伴侵害之间的相互作用就显得尤为必要。

其次,在分析人格特质与儿童/青少年同伴侵害的关系的过往研究中,对人格因素的关照有失偏颇。Yang (2006)等在分析人格维度时认为,人类的人格因素空间可以大致区分为个人取向的人格特质(以大五人格模型为代表)和社会取向(进而细分为关系、他人以及团体取向的人格特质);并且,前者主要在强调个人主义的西方社会更具生态效度,后者则在关注集体主义的东方社会意义显著。张妙清及其研究团队的工作(Cheung et al., 2011; 范为桥等, 2011)则进一步提出了人际关系取向(Interpersonal Relatedness Personality; IR)的人格因素。人际关系取向的人格因素在解释东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人类行为时显示了良好的增量效度(Cheung, Fan, & Cheung, 2017; Cheung et al., 2011; 范为桥等, 2011)。西方的人格理论是以自我为焦点,他们认为个体的行为倾向受内在动机、价值观等的影响;而对于我国这样的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人文社会环境对个体心理的发展往往具有更显著的影响,个体与环境的联系更加紧密并相互影响。因而与人际关系有关的行为倾向模式或者人格特质与同伴侵害的关系更应该得到充分的研究。

### 1.2 研究问题与假设

以往的横断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人的人际和谐性与良好的人际关系之间显著正相关。例如, Xie, Fan, Wang, 和 Cheung (2016)发现我国中学生的人际取向的人格特质可以显著正向预测他们的家庭与朋友关系的满意程度。此外,在瑞士(Malti, Perren, & Buchmann, 2010)和美国(Williford et al., 2016)等西方的儿童/青少年人群中也发现,其同理心(与对他入设身处地的情感体察有关,在人际取向人格特质上体现为“人际触觉”; 范为桥, 张妙清, 张树辉, 梁觉, 2008)与同伴侵害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因此我们推测人格特质与同伴侵害之间有交叉滞后的相互作用关系。

针对前述有关人格特质与同伴侵害研究的不足,本研究使用纵向追踪的方法探究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随迁儿童与原住民儿童的人际关系取向的人格特质与同伴侵害之间可能的相互影响。对于处于儿童晚期到青春期早期的随迁儿童或者原住民儿童来说,他们的人际关系与社会交流逐渐由父母为中心向同伴为中心过渡(Steinberg, 2014)。他们的生态环境、生理条件、认知过程都发生急剧变化,面临同伴关系、同伴地位的重组。随着父母监控的减少以及同伴群体规模和多样性的增加,使得他们暴露于消极同伴环境、受到同伴侵害的风险增加(Sugimura & Rudolph, 2012)。

针对参与研究的学生的年龄特点,我们使用了与同伴相处情况关系更密切的和谐性和人际触觉两个本土化的人际关系取向的特质,在时间序列维度上,考察这两个人格特质与同伴侵害的相互关系。和谐性指一个人避免与他人冲突的特性,与自然和社会环境保持和谐的心态(Yang, 2006)。人际触觉指一个人对他人的情绪情感的感受性或者敏感程度,也可以认为是对个体同理心的衡量。研究显示,这两个人格特质可以有效地影响中国青少年的生涯发展(Cheung, Cheung, & Fan, 2013)、生活满意度(Xie et al., 2016)以及心理健康(Cheung et al., 2017),与他们的心理发展密切相关。根据如上分析,本研究假设,个体的和谐性和人际触觉与同伴侵害之间有负向的相互作用关系。并且,对于随迁儿童和原住民儿童来说,由于各自的生活、心理境遇的差异(袁晓娇等, 2012),上述交叉滞后的相互作用关系可能有所不同。

## 2 方法

### 2.1 被试

来自上海市四所公立初中的 722 名初中预备年级学生以及他们的班主任参与了第一次数据收集。其中,上海原住民儿童 245 人(男生 50.60%; 2014 年时平均年龄为  $11.36 \pm 0.51$  岁),随迁儿童 477 人(男生 57.10%; 2014 年时平均年龄为  $11.54 \pm 0.64$  岁)。随迁儿童平均流动时间为 8.60 年( $SD = 3.27$ )。这些学生所在学校均采用融合教育方式,随迁儿童与原住民儿童混合编班。对于原住民儿童,在

父母教育程度上,有 95.59% 的父亲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且高中或中专及以上占总数的 68.28%; 有 93.36% 的母亲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且高中或中专及以上占总数的 68.58%。在父母收入水平上,有 22.12% 的父亲收入在 3000 元以下,64.05% 的父亲收入在 3000 ~ 10000 元之间,13.82% 的父亲收入在 10000 元以上; 有 35.94% 的母亲收入在 3000 元以下,57.60% 的母亲收入在 3000 ~ 10000 元之间,6.45% 的母亲收入在 10000 元以上。对于随迁儿童,在父母教育程度上,有 87.50% 的父亲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且高中或中专及以上占总数的 42.95%; 有 79.96% 的母亲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且高中或中专及以上占总数的 31.21%。在父母收入水平上,有 13.33% 的父亲收入在 3000 元以下,64.37% 的父亲收入在 3000 ~ 10000 元之间,21.85% 的父亲收入在 10000 元以上; 有 39.46% 的母亲收入在 3000 元以下,53.19% 的母亲收入在 3000 ~ 10000 元之间,7.36% 的母亲收入在 10000 元以上。

由于转学等原因导致部分被试流失,有 430 人(原住民儿童流失 23 人,随迁儿童流失 269 人)以及他们的班主任参与了第二次数据收集(初二年级)。MANOVA 检验结果显示,对于原住民儿童和随迁儿童,未参与第二次数据收集的被试与完整参加两次施测的被试在 T1 的同伴侵害、和谐性和人际触觉上无显著差异。且流失组与非流失组在性别和父亲收入水平上没有显著差异;流失组相对于非流失组具有更低的父亲教育程度、母亲教育程度以及母亲收入水平。

### 2.2 工具

**同伴侵害** 同伴侵害的测量采用教师评定和同伴评定两种方式。教师评定的同伴侵害采用教师-儿童评价量表(Teacher-Children Rating Scale)中的受欺负维度。该量表最初由 Hightower (1986) 等人编制,后由陈欣银等(Chen, Rubin, & Li, 1995)修订为中国版。该分维度包含 4 个项目,涉及了身体侵害、言语侵害和关系侵害。题目例如“别人经常骂他/她”,“别人经常把他/她排除在外,不和他/她玩”等。问卷采用李克特五级评分制,“1”代表“非常不符合”,“5”代表“非常符合”。为控制教师不同评价风格的影响,教师评价被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标准化。该量表已在我国儿童研究中得到应用(Chen, Chang, Liu, & He, 2008; Kingsbury, Liu, Coplan, & Chen, 2016),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在本研究中第一次和第二次测量的 Cronbach  $\alpha$  系数分

别是 0.77 和 0.81。

同伴评定的同伴侵害采用的《班级戏剧量表》(修订版)对个体受到的同伴侵害进行行为提名的测量。该量表最初由 Masten, Morison 和 Pellegrini (1985) 编制,后由陈欣银等(Chen, Rubin, & Sun, 1992) 修订为中国版。修订之后的班级戏剧量表包含原始量表中的攻击、亲社会、社会性和害羞-敏感维度,以及新增的同伴侵害维度。施测时给每个学生提供一个描述行为和包含班级所有学生名单的小册子。主试每读完一个行为描述,告诉学生如果他们现在指导一个班级戏剧,要求根据每句所描述内容,从本班同学中提名 3 个最符合该描述的同学。提名时,被试可以在不同项目上多次提名同一个体(包括自己),也可以提名不同性别的个体。同伴侵害包含四个项目,涉及了身体侵害、言语侵害以及关系侵害(题目例如,“某个人经常被别人骂”,“某个人经常被别人打”,“某个人经常被别人排除在外”)。作答完成之后,根据班级所有同学的提名,计算个体在每个项目上的得分,然后计算四个项目的平均分。最后,以班级为单位标准化,得到最终的同伴侵害分数。以往研究证实了班级戏剧对中国学生行为测量的较高信度和效度(Chen, 2008)。本研究中第一次和第二次测量的 Cronbach  $\alpha$  系数分别是 0.82 和 0.87。

人际关系取向的人格特质 人格特质的测量采用跨文化(中国人)个性测量表青少年版(CPA I-A)中的和谐与人际触觉两个分量表。该量表是由张妙清等采用文化共通性与特殊性的研究方法编订(Cheung et al., 2013)。其中包括一些中国人重视而西方量表忽略的反映人际关系取向的人格构念,如面子、人情、和谐、亲情等。CPAI-A 在中国青少年人群中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范为桥等,2011)。测验项目均为针对中国人青少年人格特质的自陈式描述,要求作答者根据描述是否符合自己做出判断。“是”记 1 分,“否”记 0 分。和谐性共有 14 个项目,题目例如“凡事忍让是一种美德”。人际触觉共有 12 个项目,题目例如“当我看见别人难过时,我也很容易被感染”。和谐性在本研究中第一次和第二次测量的 Cronbach  $\alpha$  系数均是 0.70;人际触觉在本研究中第一次和第二次测量的 Cronbach  $\alpha$  系数分别是 0.72 和 0.75。

经检验,本研究所使用的测量工具均具有跨组的测验等值性。

## 2.3 数据收集

我们的追踪研究包括两次间隔两年的数据收集,分别在 2014 年 10 月和 2016 年 10 月完成。在征得参与研究学校的领导和学生家长同意后,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收集数据。学生在约定的自习课时间统一参加问卷填写;班主任在各自的办公室单独完成问卷。所有问卷当场收回。两次施测的内容和程序完全一致。施测时,每个班级配备一名主试。主试均为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并经过统一施测培训。学生完成全部问卷约需 20 分钟,所有问卷当场回收。完成问卷后每个被试获得了一份价值约 20 元人民币的小礼品。

本研究中,我们采用多评分者的方式收集数据,从程序控制的角度避免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Podsakoff, Mackenzie, & Podsakoff, 2012)。其中,人格评估采用自我报告法收集,而同伴侵害则采用同伴评价和教师评价相结合的方式收集。

## 2.4 数据分析

首先,采用多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的方法,考察同伴侵害与人际关系取向人格特质在时间、性别和被试来源变量上的差异。第二,采用偏相关分析,在控制性别及 SES(包括父亲教育水平、母亲教育水平、父亲收入、母亲收入)的情况下,计算随迁儿童与原住儿童的同伴侵害与人际关系取向人格特质在两次测量中的相关。第三,采用 Mplus 7.4 进行交叉滞后模型分析,考察了随迁儿童与原住儿童的同伴侵害与人际关系取向人格特质之间的循环作用模式。为了提高被试信息的利用率,本研究将全部 722 名被试纳入分析中,并采用全息极大似然估计法(FIML)来处理缺失值。模型估计采用稳健极大似然估计(robust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or, MLR)方法。

# 3 结果

## 3.1 同伴侵害与人际取向人格特质的描述性统计

两次测量的同伴侵害、和谐性与人际触觉的均值和标准差见表 1。以测量时间[时间 1(T1), 时间 2(T2)]为被试内变量,性别(男,女)和被试来源(原住儿童,随迁儿童)为被试间变量做多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时间[Wilks'  $\Lambda$  = 0.96,  $F(4, 319) = 3.36, p < 0.05, \eta^2 = 0.04$ ]、性别[Wilks'  $\Lambda$  = 0.95,  $F(4, 319) = 4.05, p < 0.01, \eta^2 = 0.05$ ]和被试来源[Wilks'  $\Lambda$  = 0.97,  $F(4, 319) = 2.52, p < 0.05, \eta^2 = 0.03$ ]的主效

应显著。各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如表 1 所示,进一步的单变量时间差异检验结果表明,同伴评定的同伴侵害在 T1 时的程度显著高于 T2 ( $p < 0.01$ ,  $\eta^2 = 0.03$ ); 性别差异的单变量检验结果显示,男生的同伴评定同伴侵害显著高于女生 ( $p < 0.01$ ,  $\eta^2 = 0.02$ ),且其和谐性 ( $p < 0.01$ ,  $\eta^2 = 0.03$ ) 和人际触觉 ( $p < 0.01$ ,  $\eta^2 = 0.03$ ) 的水平显著低于女生; 儿童来源地单变量差异检验结果表明,随迁儿童的人际触觉水平显著高于原住儿童 ( $p < 0.01$ ,  $\eta^2 = 0.03$ )。

此外,相关分析发现,T1 时的人际触觉与父亲教育水平 ( $r = 0.08$ ,  $p < 0.05$ ) 和父亲收入 ( $r = 0.12$ ,  $p < 0.01$ ) 显著正相关,T1 时同伴评价的同伴侵害与父亲收入 ( $r = -0.08$ ,  $p < 0.05$ ) 显著负相关,T2 时的和谐性与父亲教育水平 ( $r = 0.13$ ,  $p < 0.05$ ) 显著正相关。对于流动儿童,其流动时间与 T1 和 T2 时的同伴侵害,和谐性和人际触觉的

相关均不显著。

### 3.2 同伴侵害与人格特质的交叉滞后分析

鉴于研究变量在随迁儿童和原住儿童之间的显著差异,以及部分变量之间的性别差异,后续分析将以性别及 SES 为控制变量,分随迁儿童和原住儿童两组进行。表 1 是对不同时间点报告的同伴侵害与人际取向人格特质的偏相关分析。对于原住儿童和随迁儿童,T1 和 T2 的同伴评定的同伴侵害与教师评定的同伴侵害之间均显著正相关,与 T1 和 T2 的和谐性和人际触觉之间均显著负相关。但是,随迁儿童 T1 时的教师评定同伴侵害与两个时间点的人格特质均不显著,而 T2 时的教师评定同伴侵害则与其 T1 和 T2 的和谐性显著负相关与人际触觉相关不显著; 原住儿童组,除个别结果外,教师在两个时间点评定的同伴侵害与两个时间点的人格特质均显著负相关。

表 1 同伴侵害、和谐性和人际触觉的描述统计和偏相关分析(性别及 SES 为控制变量)

	<i>M</i>	<i>SD</i>	1	2	3	4	5	6	7	8
1 同伴评定的同伴侵害 T1	0.01	1.00	—	0.60**	0.31**	0.53**	-0.16**	-0.28**	-0.13*	-0.21*
2 同伴评定的同伴侵害 T2	0.00	1.00	0.76**	—	0.24**	0.56**	-0.28**	-0.36**	-0.19*	-0.18*
3 教师评定的同伴侵害 T1	0.08	1.07	0.32**	0.25**	—	0.26**	-0.06	-0.11	-0.09	-0.07
4 教师评定的同伴侵害 T2	0.02	1.00	0.64**	0.53**	0.22**	—	-0.22**	-0.24**	-0.10	-0.14
5 和谐性 T1	10.52	2.66	-0.15*	-0.13	-0.26**	-0.16*	—	0.38**	0.43**	0.23**
6 和谐性 T2	10.96	2.55	-0.16*	-0.16*	-0.14*	-0.21**	0.29**	—	0.28**	0.43**
7 人际触觉 T1	7.40	2.83	-0.21**	-0.17*	-0.17**	-0.22**	0.47**	0.05	—	0.49**
8 人际触觉 T2	7.70	2.92	-0.24**	-0.24**	-0.10	-0.29**	0.15*	0.34**	0.44**	—

注: 对角线下面是原住儿童的同伴侵害、和谐性和人际触觉的相关分析结果; 对角线上方是随迁儿童的同伴侵害、和谐性和人际触觉的相关分析结果。\*  $p < 0.05$ ; \*\*  $p < 0.01$ 。

为检验交叉滞后的跨组一致性,我们进行了多组比较。非限制模型的拟合指数良好:  $\chi^2 = 38.34$ ,  $df = 23$ ,  $CFI = 0.98$ ,  $RMSEA = 0.033$ ,  $SRMR = 0.034$  Wald test 检验结果发现,限制模型与非限制模型之间的差异显著 [ $\chi^2(4) = 36.58$ ,  $p < 0.01$ ]。因此,在进行交叉滞后分析时,需要分为原住儿童和随迁儿童两组。基于上述关于同伴侵害与人格特质关系的分析,我们进一步采用交叉滞后分析考察了从 T1 到 T2 人际取向的人格特质(和谐性与人际触觉)与同伴侵害的相互影响。交叉滞后分析中,同伴侵害为潜变量,同伴评价的同伴侵害和教师评价的同伴侵

害是其两个测量指标。同时为了排除性别和 SES 在模型中的影响,设定性别及 SES 预测两次测量中的各核心变量,且最终模型中仅保留显著预测的路径(为了模型的简洁性,路径未在图中标出)。最终的模型结果如下图 1(原住儿童)和图 2(随迁儿童),且各拟合指标良好。由图 1 可知,对于原住儿童来说,T1 时个体受到的同伴侵害会负向预测其 T2 的和谐性和人际触觉的水平。对于随迁儿童来说,同伴侵害与和谐性之间有负向的交叉滞后关系,且 T1 时个体受到的同伴侵害会负向预测其 T2 时人际触觉的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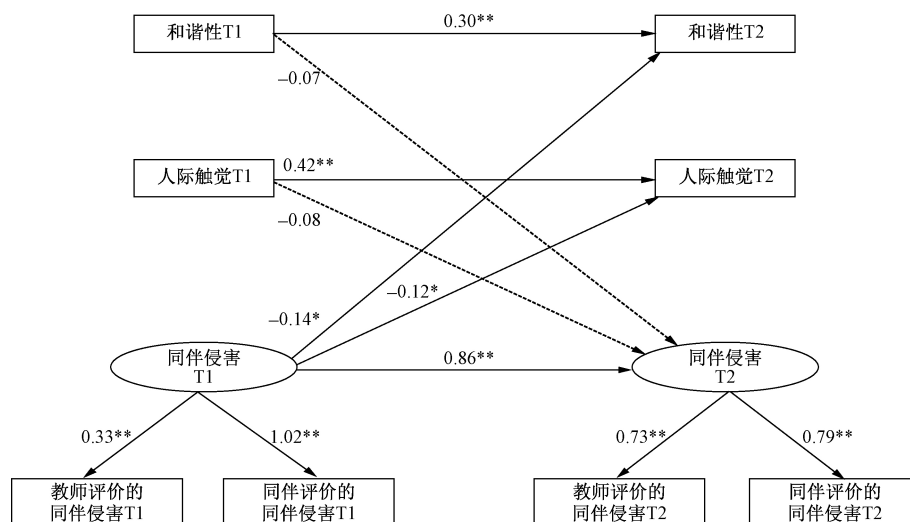


图1 原住儿童的同伴侵害、和谐性和人际关系的交叉滞后分析结果

(注: 虚线表示路径不显著, 实线代表路径显著。模型拟合指数:  $\chi^2 = 28.80$ ,  $df = 25$ ,  $CFI = 0.99$ ,  $RMSEA = 0.027$ ,  $SRMR = 0.057$   $^{\#}p < 0.07$ ;  $^*p < 0.05$ ;  $^{**}p < 0.0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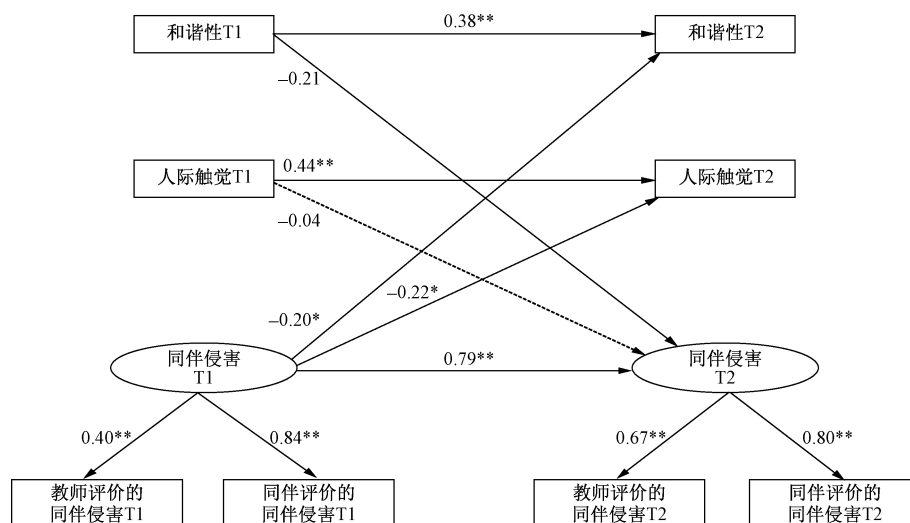


图2 随迁儿童的同伴侵害、和谐性和人际关系的交叉滞后分析结果

(注: 虚线表示路径不显著, 实线代表路径显著。模型拟合指数:  $\chi^2 = 24.24$ ,  $df = 18$ ,  $CFI = 0.98$ ,  $RMSEA = 0.027$ ,  $SRMR = 0.046$   $^*p < 0.05$ ;  $^{**}p < 0.01$ )

## 4 讨论

### 4.1 同伴侵害与人际关系取向人格特质的时间变化与组别差异

在纵向比较的视角, T2 的同伴报告的同伴侵害显著低于 T1 的结果或许说明, 随着时间的推进, 采用随迁儿童与原住儿童混合编班的融合教育模式有利于不同来源的儿童逐渐适应新的学习环境(叶枝, 柴晓运, 郭海英, 翁欢欢, 林丹华, 2017), 从而减少学生之间侵害的可能性。

横向比较上, 多数以往研究发现遭受同伴侵害

的随迁儿童占总数比例要远远高于在一般儿童中的比例(郭海英等, 2017; Ye et al., 2016)。有别于以往的结果, 我们发现原住儿童与随迁儿童在同伴侵害的程度上没有显著差异。这一结果的原因之一很可能是参与本研究的随迁儿童所处教育和生活环境有别于以往研究的儿童。目前国内发表的有关随迁儿童同伴侵害的研究多以北京地区的随迁儿童为被试(郭海英等, 2017)。文献表明, 以往北京地区的随迁儿童大多在私立的农民工子女学校学习(Ye et al., 2016), 其受教育环境与当地城市的主流环境隔离(何玲, 李兵, 2007); 因而他们可能遭受更多的

同伴侵害(师保国,王芳,刘霞,康义然,2014)。然而,参与本研究的随迁儿童则在公立学校与原住民混合编班接受融合教育(上海市教育委员会,2008)。公立学校具有稳定、规范的教育环境,随迁儿童在学校能得到同学和老师的更多关照和帮助,且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城市本地的社会文化环境,有利于其融入和适应(叶枝等,2017)。我们推断正是这种融合教育的方式使随迁儿童并没有受到更多的同伴侵害。

有关人际取向人格的比较方面,随迁儿童的人际触觉水平显著高于原住民儿童这一结果,一定意义上说明随迁儿童对他人的感受更加敏感并且有更好的同理心。这可能是由于随迁儿童相对丰富的生活变迁阅历使他们心理上更加成熟(Ye et al., 2016),因此也更加容易体察和理解他人(Au, Wong, Lai, & Chan, 2011)。事实上,随迁儿童为了更好地适应城市的生活,也需要主动地了解城市的生活与文化(邹泓等,2015)。显然,作为原住民的同学为他们适应城市环境提供了最为便利的条件。

性别差异方面,男生的同伴侵害程度显著高于女生。这与已有研究结论一致(郭海英等,2017)。男生往往有更高的攻击倾向,且攻击性强的儿童又多以男生为欺负对象,因此男生更容易受到别人的侵害。另一方面,本研究中男生的和谐性低于女生的现象可能一定程度上解释和支持了男生比女生有更强的攻击性或者同伴侵害(纪林芹等,2012)。此外,本研究中男生人际敏感性低于女生的结果则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以往西方青少年研究中男生的同理心低于女生的结果(Bojana, Jasmina, Valentina, & Ilija, 2016; Del Rey et al., 2016)。

#### 4.2 同伴侵害与人际关系取向人格特质的相互作用

社会环境与社会关系(如同伴关系)在塑造青少年人格结构中的作用日益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Caspi, Roberts, & Shiner, 2005; Reitz, Zimmermann, Hutteman, Specht, & Neyer, 2014)。有鉴于此,本研究从人际取向人格特质和同伴侵害相互作用的视角拓展了人格可塑性的研究议题。

对于原住民儿童来说,T1时受到的同伴侵害会负向影响其T2的和谐性和人际触觉。即早期受到的同伴侵害越多,后期可能会更容易不重视与别人维持的和谐关系,更有可能倾向于与人争论且不太包容别人;并在理解别人的感受方面具有一定的困难,

甚至会有意地避免与人接触。这与以往对同伴侵害的影响研究较为一致。例如,在瑞士(Malti et al., 2010)、美国(Williford et al., 2016)、希腊(Kokkinos & Kipritsi, 2012)等地的儿童样本中发现,同理心与同伴侵害显著的负相关。Hoglund 和 Leadbeater (2007)也发现英国的初中生受到越多的同伴侵害会,则越不容易理解他人;其同伴交往、社会接纳的能力也会越差。这样,一方面,同伴侵害会导致儿童和谐性和人际触觉水平降低,对他们人格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比如导致他们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表现出较低的同理心。同时,受侵害的儿童同理心水平的降低可以减少他们与其他儿童的情感沟通,进而促使儿童不受情感问题的困扰,并可能促使受侵害的儿童更加关注自身的需要和愿望,一定程度上可以使得他们从心理上远离被侵害的伤痛经历(Malti et al., 2010)。

对于随迁儿童来说,除了与原住民儿童相同的T1受到的同伴侵害会负向影响其T2的和谐性和人际触觉之外,研究还发现T1的和谐性会负向预测T2的同伴侵害。据此,如果随迁儿童具有跟别人融洽相处、避免冲突的特质或者态度,就不易被同伴侵害。这与前人有关宜人性与同伴侵害关系的研究结果比较接近。尽管宜人性与人际取向的人格特质不同,但也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个体具有受人喜欢的某些特点(范为桥等,2011)。Jensen-Campbell 和 Malcolm (2007)发现儿童的宜人性与受欺负的程度呈负相关,对人友善的儿童更少受到同伴欺负。此外,随迁儿童中的同伴侵害与和谐性的相互作用关系反映“积极者更积极,消极者更消极”的关系。较高的和谐性可以使得儿童较少受到同伴侵害,进而促进其未来和谐性的发展。对于和谐性较低的儿童,更加容易受到同伴侵害,进而对和谐性产生负面影响。

## 5 研究的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参照发展情景理论的框架探讨了随迁儿童与原住民儿童的人际关系取向人格特质和同伴侵害的差异以及这两个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

第一,通过分析人际关系取向人格特质与同伴侵害的相互影响,我们的研究支持了同伴侵害会对儿童的人格发展不利影响的观点(Kawabata et al., 2014)。因此,加强对包括随迁儿童和原住民儿童在内所有城市儿童中同伴侵害问题的预防和干预是非常必要的。学校和家庭都应该努力对儿童给予恰当

的避免侵害他人和避免被他人侵害的教育。加强儿童之间、师生之间以及亲子之间的良好有效的沟通可能是避免主动和被动侵害的有效途径。

第二, 本研究中显著的交叉滞后效应反映的随迁儿童人群中和谐性与受侵害的负性循环作用关系, 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格特质与所处环境的动态相互作用模式。一方面可以鼓励和帮助随迁儿童发展和谐性的人格特点, 鼓励他们学会与同伴相处, 从而降低其遭受侵害的可能性。另一方面, 对于已经遭受同伴侵害的儿童, 我们也要教会他们保护自己, 或者为他们提供必要的环境保护条件, 防止同伴侵害的持续发生, 并协助他们尽可能以平和的心态甚至信念与人沟通, 逐步适应新的环境与挑战。

第三, 原住儿童与随迁儿童混合编班的融合教育的方式既有助于随迁儿童适应城市生活与学习环境, 也有利于原住儿童积极应对变迁的社会环境。本研究并没有像以往研究那样发现随迁儿童比原住儿童遭受了更多的同伴侵害。让随迁儿童与原住儿童在同一个教室里学习, 在同一个校园里成长的融合教育环境, 事实上为随迁儿童适应与家乡的农村文化迥异的环境提供了最为有利的条件。

## 参考文献:

- Ames, M., & Leadbeater, B. (2017). Overweight and isolated: The interpersonal problems of youth who are overweight from adolescence into young adulthoo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41, 390–404.
- Au, A. M. L., Wong, A. S. K., Lai, M. K., & Chan, C. C. H. (2011). Empathy, coping, social support, and mental health in local and migrant adolescents in Beij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Disability and Human Development*, 10, 173–178.
- Bojana, D. M., Jasmina, K. S., Valentina, S. T., & Ilija, M. Z. (2016). Empathy and peer violence among adolescents: Moderation effect of gender. *School Psychology International*, 37, 359–377.
- Caspi, A., Roberts, B. W., & Shiner, R. L. (2005).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Stability and change.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6, 453–484.
- Chen, X. (2008). Shyness and unsociability in cultural context. In A. S. LoCoco, K. H. Rubin, & C. Zappulla (Eds.), *Social withdrawal in childhood* (pp. 143–160). Milan: Unicopli.
- Chen, X., Chang, L., Liu, H., & He, Y. (2008). Effects of the peer group o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functioning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A longitudinal study in Chinese children. *Child Development*, 79, 235–251.
- Chen, X., Rubin, K. H., & Li, Z. Y. (1995). Social functioning and adjustment in Chinese children: A longitudinal study.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1, 531–539.
- Chen, X., Rubin, K. H., & Sun, Y. (1992). Social reputation and peer relationships in Chinese and Canadian children: A cross-cultural study. *Child Development*, 63, 1336–1343.
- Chen, X., & Schmidt, L. A. (2015). Temperament and personality. In M. E. Lamb (Vol. Ed.) & R. M. Lerner (Series Ed.) (2015),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Developmental Science: Socioemotional Processes* (Vol. 3, 7th edition) (pp. 152–200). Hoboken, NJ, US: John Wiley & Sons Inc.
- Cheung, F. M., Cheung, S. F., & Fan, W. (2013). From Chinese to cross-cultural personality inventory: A combined emic-etic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personality in culture. In M. J. Gelfand, C. Chiu & Y. Hong (Eds.), *Advances in culture and psychology* (vol. 3) (pp. 117–17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eung, F. M., Fan, W., & Cheung, S. F. (2017). Indigenous measurement of personality in Asia. In A. T. Church (Ed.), *The Praeger Handbook of Personality across Cultures* (pp. 105–135). Santa Barbara, CA, USA: ABC-CLIO/Greenwood Praeger.
- Cheung, F. M., van de Vijver, F. J. R., & Leong, F. T. L. (2011). Toward a new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personality in culture. *American Psychologist*, 66, 593–603.
- De Bolle, M., & Tackett, J. L. (2013). Anchoring bullying and victimization in children within a Five-Factor Model-based person-centred framework. *Europe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27, 280–289.
- Del Rey, R., Lazuras, L., Casas, J. A., Barkoukis, V., Ortega-Ruiz, R., & Tsorbatzoudis, H. (2016). Does empathy predict (cyber) bullying perpetration, and how do age, gender and nationality affect this relationship? *Learning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45, 275–281.
- Fung, A. L., & Raine, A. (2012). Peer victimization as a risk factor for schizotypal personality in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Disorder*, 26, 428–434.
- Heaven, P. C. L., Leeson, P., & Ciarrochi, J. (2009).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t school: Assessing a reciprocal influence model of teachers' evaluations and students' personality.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43, 815–821.
- Hightower, A. D., Work, W. C., Cohen, E. L., Lotyczewski, B. S., Spinell, A. P., Guare, J. C., et al. (1986). The Teacher-Child Rating Scale: A brief objective measure of elementary children's school problem behaviors and competences. *School Psychology Review*, 15, 393–409.
- Hoglund, W. L. G., & Leadbeater, B. J. (2007). Managing threat: Do social-cognitive processes mediate the link between peer victimization and adjustment problems in early adolescence?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17, 525–540.
- Jensen-Campbell, L. A., & Malcolm, K. T. (2007). The importance of conscientiousness in adolescent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3, 368–383.
- Kawabata, Y., Youngblood, J., & Hamaguchi, Y. (2014). Preadolescents' borderline personality features in a non-Western urban context: Concurrent and longitudinal associations with physical and relational aggression, friendship exclusivity and peer victimization.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7, 219–228.
- Kingsbury, M., Liu, J., Li, D., Coplan, R. J., & Chen, X.



- (2016). Assessment and implications of coping styles in response to a social stressor among early Adolescents in China. *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 36, 222 – 250. doi: 10.1177/0272431614561262
- Knack, J. M., Jacquot, C., Jensen-Campbell, L. A., & Malcolm, K. T. (2013). Importance of having agreeable friends in adolescence (especially when you are not).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43, 2401 – 2413.
- Kokkinos, C. M., & Kipritsi, E. (201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ullying, victimization, trait emotional intelligence, self-efficacy and empathy among preadolescents. *Social Psychology of Education: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15, 41 – 58.
- Kokkinos, C. M., Voulgaridou, I. P., Koukoutsis, N. D., & Markos, A. (2016). Peer victimization and depression in Greek preadolescents: Personality and attachment as moderators.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3, 280 – 295.
- Lerner, R. M. (2006). Developmental science, developmental systems, and contemporary theories of human development. In W. Damon & R. M. Lerner (editors-in-chief) and R. M. Lerner (vol. ed.),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Vol. 1: Theoretical models of human development* (6th ed., pp. 1 – 17, 43 – 61, 542 – 548). Hoboken, NJ: Wiley.
- Leadbeater, B., & Hoglund, W. (2006). Changing the social contexts of peer victimization. *Journal of the Canadian Academy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15, 21 – 26.
- Malti T., Perren, S., & Buchmann, M. (2010). Children's peer victimization, empathy, and emotional symptoms. *Child Psychiatry and Human Development*, 41, 98 – 113.
- Masten A S, Morison P, & Pellegrini D S. (1985). A revised class play method of peer assessment.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1, 523 – 533
- McDonnell, J., Stahl, D., Day, F., McGuire, P., & Valmaggia, L. R. (2017).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in those at clinical high risk for psychosis mediate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hildhood bullying victimization and paranoid ideation: A virtual reality study. *Schizophrenia Research*, doi: 10.1016/j.schres.2017.04.029
- Mynard, H., & Joseph, S. (2000). Development of the multidimensional peer-victimization scale. *Aggressive Behavior*, 26, 169 – 178.
- Podsakoff, P. M., Mackenzie, S. B., & Podsakoff, N. P. (2012). Sources of method bias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and recommendations on how to control it. *Ann. Rev. Psychol.* 63, 539 – 569.
- Reijntjes, A., Kamphuis, J. H., Prinzie, P., & Telch, M. J. (2010). Peer victimization and internalizing problems in children: A meta-analysis of longitudinal studies. *Child Abuse & Neglect*, 34, 244 – 252.
- Reitz, A. K., Zimmermann, J., Hutteman, R., Specht, J., & Neyer, F. J. (2014). How peers make a difference: The role of peer groups and peer relationships in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Europe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28, 279 – 288.
- Steinberg, L. (2014). *Adolescence* (10th ed.). New York: McGraw-Hill.
- Sugimura, N., & Rudolph, K. D. (2012). Temperamental differences in children's reactions to peer victimization.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 Adolescent Psychology*, 41, 314 – 328.
- Williford, A., Boulton, A., Forrest-Bank, S., Bender, K., Dieterich, W., & Jenson, J. (2016). The effect of bullying and victimization on cognitive empathy development during the transition to middle school. *Child & Youth Care Forum*, 45, 525 – 541.
- Xie, Q., Fan, W., Wang, P., & Cheung, F. M. (2016). Personality and parenting style as predictors of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Chinese secondary students. *The Asia-Pacific Education Researcher*, 25, 423 – 432.
- Yang, K. S. (2006). Indigenous personality research: The Chinese case. In U. Kim, K. S. Yang, & K. -K. Hwang (Eds.), *Indigenous and cultural psychology: Understanding people in context* (pp. 285 – 314). New York, NY: Springer.
- Ye, Z., Chen, L., Harrison, S. E., Guo, H., Li, X., & Lin, D. (2016). Peer victimization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rural-to-urban migrant children in china: the protective role of resilience.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7, 1 – 10.
- 范为桥, 张妙清, 张树辉, 梁觉. (2008). 香港中学生人格特质的性别差异及其发展性分析. *心理学报*, 40, 1002 – 1012.
- 范为桥, 张妙清, 张建新, 张树辉. (2011). 兼顾文化共通性与特殊性的人格研究: CPAI 及其跨文化应用. *心理学报*, 43, 1418 – 1429.
- 冯帅章, 陈媛媛, 金嘉捷. (2017). 城市的未来——流动儿童教育的上海模式. 上海: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 郭海英, 陈丽华, 叶枝, 潘瑾, 林丹华. (2017). 流动儿童同伴侵害的特点及与内化问题的循环作用关系: 一项追踪研究. *心理学报*, 49, 336 – 348.
- 何玲, 李兵. (2007). 中国流动儿童政策分析. *人口研究*, 31, 71 – 80.
- 纪林芹, 魏星, 陈亮, 张文新. (2012). 童年晚期同伴关系不利与儿童的攻击行为: 自我概念与同伴信念的中介作用. *心理学报*, 44, 1479 – 1489.
-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2008).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农民工同住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 沪教委基(2008) 3 号.
- 上海市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 (2017). *上海统计年鉴*.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 师保国, 王芳, 刘霞, 康义然. (2014). 国内流动儿童心理研究: 回顾与展望. *中国特殊教育*, (11), 68 – 72.
- 叶枝, 柴晓运, 郭海英, 翁欢欢, 林丹华. (2017). 流动性、教育安置方式和心理弹性对流动儿童孤独感的影响: 一项追踪研究. *心理发展与教育*, 33, 595 – 604.
- 袁晓娇, 方晓义, 刘杨, 蔺秀云. (2012). 流动儿童压力应对方式与抑郁感、社交焦虑的关系: 一项追踪研究. *心理发展与教育*, 28, 283 – 291.
- 邹泓, 刘艳, 张文娟, 蒋索, 周晖, 余益兵. (2015). 青少年社会适应的保护性与危险性因素的评估. *心理发展与教育*, 31, 29 – 36.

## A Cross-lagged Study of Peer Victimization and Children's Interpersonal Relatedness Personality Traits: A Comparis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Children

LI Mengting<sup>1</sup> FAN Weiqiao<sup>1</sup> CHEN Xinyin<sup>2</sup>

(1. School of Education,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334;

2.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A 19104-6216, USA)

**Abstract:** Although previous studies largely supported that peer victimization correlates with personality that mainly bases on Big Five model focused on intrapersonal dimensions, limited research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er victimization and interpersonal relatedness personality, effectively highlighted in Chinese context. Our study examined the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eer victimization and harmony and social sensitivity, at both rural migrant and urban children with a two-year longitudinal design.

Seven hundred and Twenty-Two Preliminary Junior students, including 245 urban children (50.60% female;  $M_{age} = 11.36$  years old,  $SD = 0.51$ ) and 477 migrant children (57.10% female;  $M_{age} = 11.54$  years old,  $SD = 0.64$ ) from four junior secondary schools in Shanghai, were recruited. Two waves of data collection were conducted with a two-year interval. Peer victimization was assessed by the approach of peer behavior nomination with the Revised Class Play and teacher reports with Teacher-Child Rating scale. Interpersonal relatedness personality (i.e., harmony and social sensitivity) was measured with the Cross-Culture (Chinese) Personality Assessment Inventory for Adolescents.

Peer nomination of peer victimization showed a significant decrease from Wave I to Wave II. Migrant group reported higher levels of social sensitivity than did the urban group.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peer victimization and both harmony and social sensitivity were supported across both groups. Cross-lagged path analyses were conducted after controlling for gender and SES. Peer- and teacher-rated peer victimization were two indicators of the latent peer victimization. (1) A reciprocal negative effect between peer victimization and harmony was supported at the migrant group. (2) As for the urban group, only the negative effect was significant from peer victimization at Preliminary Junior to harmony at Junior Two. (3) Peer victimization at Preliminary Junior had a negative effect on social sensitivity at Junior Two across the two groups.

Conclusively, the negative influences of peer victimization on children's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t the junior school period should be tried to reduce or avoid in the practice of integrated education and school management. For instance, a harmony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might be beneficial to reducing peer victimization and promoting their adaptation to urban environment. Alternatively, with the social change 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city-lived adolescents including both migrant and native populations should adapt the multi-cultural society and life-styles with open minds.

**Key words:** rural migrant children; urban native children; peer victimization; interpersonal relatedness personality; cross-lagged analysis